

思想“在场”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点

CONTENTS

01

近几年社会史研究回顾

02

思想“在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点

PART

01

近几年社会史研究回顾

中国社会史研究回顾：学术兴趣与现实关怀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1920s

20世纪初

梁启超：新史学
帝王将相之家谱 → 民史

西方史界

1920-1930s, 年鉴学派创立：总体史

“大论战”：
社会发展史/社会形态演
进史

1930s

1940s

眼光向下的历史：人类学、
民俗学、田野调查。
来自社会学家的贡献

政治史化的社会史

1950s

1970s

1980s

史学社会科学化

战后-1970s, “新社会史”

柯文：中国中心观

复兴

1986

1986年1月，冯尔康发表
《开展社会史研究》
1986年10月，第一届中国
社会史年会召开

文化人类学
田野调查、话语分析

1980s-, “新文化史”

80年代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回顾：成果与争论

- 第一讲曾经讲过，自20世纪6、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主张以被研究的社会本身为中心展开学术书写，其中最为中国学界所知的就是柯文在1984年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的主张。
- 其实仔细审视中国中心观，我们可以发现这不仅仅是对“冲击回应”模式的一个挑战，也同时是对传统宏大叙事的一种挑战。柯文所提出的“内部取向”的完整表述是：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

80年代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回顾：成果与争论

- 而在国内，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复兴之后，也大体经历了从“整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阶段。在9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开始走出以“中国-世界”这种关系为参照考察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思路，开始向“空间”转换。
- 随着西方史学的“语言/文化”转向以来，田野调查、口述访谈等方法也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进村找庙、进庙找碑”俨然在学界流行，一时间中国的历史学家纷纷扎进了乡野，学术视野的地方化和区域化几乎成为了主流范式。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 近来将视野地方化或区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几乎成为主流范式。许多研究采取了“以甲村为中心的考察”、“以乙县为例”、“某某制度在丙地”的空间视角。
- 以“婚姻法贯彻/婚制改革”为例，在《党史研究》与《当代中国》上论文标题：
 - 新中国成立初期贯彻《婚姻法》运动中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以河南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 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的推行与基层干部动员和教育——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贯彻婚姻法运动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婚姻制度的改革
 - 1950年《婚姻法》与华北农村婚姻制度的鼎革

.....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 这种范式的兴起一开始是令人振奋的，因为它在形式上区别于以往的空疏学风，避免了以往研究在史料上的过于“上层”与单一（中央文献汇编/国家统计年鉴）；新兴的区域史研究往往对研究对象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界定，并多采用地方档案、地方报纸、地方志书和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对既有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来自地方经验的修正或补充。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 好的区域/地方史研究，能够让我们深化对“全国”的认识。首先，区域史揭示了国家政策在地方的贯彻实施效果，视线下移至政策的落点，展现了“国家”之外的“社会”，同时能够加深我们对“政治”与“权力”的理解；其次，区域史往往为国家政策的“文本”提供了实践过程，提供了来自地方的“米提斯”，展现了“民族国家”一统天下之下复杂丰富的地方面相。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 例如，应星《身体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对发生在集体化时期某一个村庄中几件与“身体”有关的案件的处理过程进行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与村民日常策略之间既非极权主义的“全面压制”、又非《国家的视角》那般“全面失败”的截然对立、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互相为用、复杂的利用与“共谋”的关系。
- 该文采用福柯“权力是一种生产性实践”的观点作为中层理论，既超越了许多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简单地将权力视作“上面”（国家）的东西，又超越了人类学家对权力关系往往采取静态分析、过于日常化的处理。

“我们也许可以把中国村庄在集体化时期所发生的权力关系的变化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文明的实践形态。这种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通过各种复杂的技术和策略，通过各个社会成员的相互作用，在不断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同时，也不断塑造着国家本身。”

（应星：《身体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对中国集体化时期一个村庄若干案例的过程分析》，[美]黄宗智编《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第134页。）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 再如，王笛的《茶馆》以“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和“（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这两条线索展开，将区域史研究置于20世纪现代化国家建构中国家政权深入基层的历程中考察。正如作者所论，“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
- 微观视野与宏观历史进程的有机结合使得这部著作对成都茶馆的考察获得超出区域研究的意义，也使该著作在讨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过程时得到了地方史料的有效支撑。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但是，就目前而言，区域史研究越来越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倾向。

- 其一，对微观单位的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广阔领域的研究的线索？——人类的活动固然受地方风貌和地区性特有形态的影响，但同样也受整个文化总体的影响。过分强调地方的经验，会使得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貌似有理”的“说明”而非“解释”。
- 每个“村庄故事”都在一定程度上是闭合的，具有不同的背景和解释变量，在不同历史事件上，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有不同的权重。例如，在改造沿海渔业社会的问题上，广东在这一过程中注意汉民同胥民之间的“民族矛盾”，而浙江则集中于将生产过程集体化和移除迷信崇拜等方面。因此，就改造渔业社会这项全国性政策的推行而言，究竟是以关注族群矛盾为首，还是移除迷信崇拜为首，这也是个案无法解释的。
如果个案研究没有指涉超越个案经验本身的解释框架，其研究价值是相对有限的。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 何谓“貌似有理”

■ 即研究所得之结论，只是一种“事后解释”：好像所列举的事实和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这种解释的逻辑确实符合这种事实所能提供的想象空间，但未必符合其他事实。换言之，“貌似有理”的解释所能够容纳的样本多样性是十分贫乏的。

■ 例：

经验事实（数据）

失业人口读书减少

失业人口读书增多

解释

焦虑/压力使人无法专注

失业使人变闲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 很多研究者选择田野调查的对象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家乡，致使社会史研究成为了“家乡历史学”。如果每个研究者都只专注于自己的地域，你的家乡我不了解，我的家乡你没兴趣，满足于个人的“自言自语”，这样一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很难形成具有内在统一规范和实名的学术共同体，鲜有可以共同讨论的话题。
- 中国的乡村不可胜数，将这些乡村无分析地白描之后，所获得的无数颗沙粒真的能够砌成高塔吗——把中国所有的村庄加起来之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出一个真实的中国？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 其二，空有“史实”而无新“史识”，个案研究沦为同一框架下不同史料填充的重复劳动。在当代社会史学界，早有论者提倡区域社会史研究要经过“地方”、“地方至全国”、“全国至地方”三次视野的转换，进而形成某一全国性研究的“上海视角”、“北京视角”等有地方独特性的解释。
- 但更多的研究往往出现这样的倾向：即并未经过“地方-国家”的往复过程，而仅仅是某一全国性政策的同质化的“上海过程”或“北京过程”，地方仅仅是国家的“缩影”，与90年代以前采取宏观史料得出的过程无本质上的不同。这种对同一命题的重复证明，不但没有“填补”所谓“空白”，而且往往因为既定的叙事框架而使得真正待以深挖的问题被就此搁置。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 仍以建国初期《婚姻法》贯彻与婚制改革为例，尽管刊在《党史研究》与《当代中国史研究》二刊上的文章有诸如“上海”“西南地区”“中南区”“华北农村”的“空间”区别，但在文章脉络上，均为“政策背景-出台-下达-问题-纠偏-评价”。

• 过程简要概述：

- 1950. 5.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废除包办、强迫结婚；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等；并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原则。
- 1951年-1952年贯彻，取得一定成果，但存在各种问题：群众觉悟不高、干部觉悟不高，“封建意识”
- 1952. 11、1953. 2 中共中央、政务院分别印发《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
- 1953. 3 婚姻法宣传月
- 基本评价：①废除封建婚姻陋俗（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减少，婚姻观念和择偶标准变化、婚姻家庭关系的好转）；②提高妇女地位；③动员了妇女的积极性，积极进入生产领域。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 这些作者将“国家”看成无所不能的行为主体，尽管他们不否认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但往往认为在“国家”的“纠偏”之后，改造社会的目标就能够达成——于是，社会改造政策的“文件”版本的设定目标（总结报告）就与社会改造的最终“结果”高度一致。
- 而实在没有达成之处，则一并归为“封建思想浓厚” / “运动式治理难以长久”的空疏之语，而缺乏更加富有历史学家责任感的理论性批判——虽然文章的研究对象是属于“社会史”、“地方史”的，但从其内在思维的本质而言，仍然是“国家”与“宏观”的。

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 其实这些研究中，不乏有一些有益的细节可以进行继续挖掘：
- 比如，新婚姻法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带来了使高级官员和年轻有姿色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而使得男性贫苦农民处于不利地位；
再比如，对婚姻法遭到抵制的原因回溯到经济关系，如离婚财产的分割问题与聘礼退回的问题。
- 但受制于既有的叙事框架，这些地方性的实践并没有真正成为地方性的“视角”，而更多地成为了国家文件话语下同义重复的地方版本。

总体史的呼唤：告别“剩余的历史”

-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地方经验的特殊性，也有总体的同一性与规律性。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不应当只是对前三十年因取缔社会学而被学界遗忘的学术领域的简单恢复，而更应当被作为一场“史观革命”之下，一场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的全面更新。
- 一些政治史研究者对社会史研究成果置若罔闻，甚或讥讽为“鸡零狗碎”与“剩余的历史”，虽然有失之偏狭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部分社会史研究者的局限之处：有感于过去史学研究过分注重宏观政策与顶层设计的倾向，许多学者致力于对以往的“边缘”对象进行发掘，醉心于个案的白描书写，记录一村一地的婚丧嫁娶、乡俗礼仪，在“视野下移”的驱动下远离乃至搁置“政治”。

总体史的呼唤：告别“剩余的历史”

- 其实，**政治史与社会史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那么社会生活的乐趣将失去一半，政治运动的意义也将去其大半。正如张静如先生曾指出的那样，“严格地说，能够上史书的群众生活，也很难完全脱离政治。表面上似乎与政治无关，其实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同明清社会史不同，当代社会史从最初阶段就有统一的中央政权；而且与传统社会的“礼治”、国权以士绅为中介到达地方不同，**集体化与单位制曾深刻地形塑了共和国的历史，共产党国家以其严密的组织、可靠的干部队伍将“支部建在连上”，现代化的通讯交通网络也为国家的触角伸向基层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当代社会史中的区域不是最终“变成了中国”，而是最初就作为“中国”而变迁。虽说要“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警惕国家话语的霸权，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始终是与**

总体史的呼唤：告别“剩余的历史”

- 民族国家建构的步伐紧密相连的，这种“中国性”不是当代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终点，而是起点；“政治”与“国家”不是可以如搭积木般简单移去的背景板，而是同时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实践，不仅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也改造着人们的心灵，浸透在人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涵盖在社会变迁的每一个维度之中。
- 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变迁，就与当时政治社会环境变化息息相关。该项制度的指导方针，经历了从集体合作、社会运动为依托，转向抛给家庭和个体，再转入以国家为主并鼓励多方参与的思路这一变迁历程。这种变化也印证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演变逻辑。
- 我们不否认对民风民俗的挖掘是有其意义的，但是，如果沉溺于对资料的搜集本身，那么其将很难避免沦为猎奇式小说的境遇，而丧失了历史学科应当有的担当。

总体史的呼唤：告别“剩余的历史”

- 金观涛曾言，“就历史研究而言，如果没有关心人类命运的宏大心灵和跨学科研究纲领，那么再专业化的诉求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
- 实际上，社会史视角是试图从“小切口”出发关注“大问题”，从而观照整体社会历史变迁的脉络。如果学人的认识不能转变，那么社会史学科的边缘化地位将很难改变，学术研究的价值也很难得到彰显。
- 就如E.H. 卡尔之言，“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

PART

02

**思想“在场”：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点**



思想“在场”

- 前文所列举的社会史研究中的优秀之作与一些令人遗憾的倾向，二者根本的差别在于思想性的有无。这种“思想”不是泛泛而谈的知识储备或理论修养，而是一种具体的反思能力和学术自觉。
- 具体来讲，大致有几个可以着手的路径：

有意识地与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对话

找准问题意识，尝试建构社会史研究的“中层理论”

进行认真而有价值的对比

.....

思想“在场”：与前人对话

- “思想”的缺位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的一种表现是：一些学者往往在论文开头以颇为简略的方式穷举前人所述，然后挑一个以往缺史料支撑的地方去开题立意，并名之曰“填补前人研究的空白”。健全的学术生态是建立在对话之上，鲜有初来乍到的问题。
- 研究者在开题立意时，要明确自己是在哪个研究领域的讨论中同哪个（或哪些）学者的理论或观点展开对话——尽可能尝试与该问题上最一流的学者对话。
- 反观所谓的“填补空白”，往往是因研究者忽视前人为何在学术史脉络中对该问题有所忽略这个现象造成的。不明晰前人为何在此处留下“空白”（是当时整体认识水平有限，还是当时学术界主流范式的局限性导致的，还是当时相关资料的缺失），那“填补”这个“空白”的努力就很难深入。

思想“在场”：建构“中层理论”

- 前文曾简要介绍了何谓“貌似有理”，这个批判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有关“中层理论”一章——批判“貌似有理”的“事后解释”，其实就是为了提出“中层理论”。
- **“中层理论”**是指研究者要在纷繁琐碎的资料和宏大不当的抽象理论之间找到一个对话中介，使得孤立的个案同超出个案界限的解释框架发生关联，进而由各个“中层”的理论出发去反思既有的宏大理论构想。
- 前文所举的王笛的《茶馆》，其中层理论是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应星的《身体政治》，其中层理论是福柯的“权力生成说”。再比如，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即有中层化、抽象于一般经验事实的努力，即提出了“关中模式”而使文章脱离了“关中版本”。

思想“在场”：进行认真而有价值的对比

- 对比之下，方能既彰显个性，又不失整体——明确研究对象在整体的历史脉络、空间上的“国家”乃至“世界”之中所处的地位，能够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本身的传承更迭及其意义、也能够对人类社会的丰富性与统一性有更深的印象。
- 如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序言中所述，在研究中国工厂制度的过程中，要想理解“依附”到底意味着什么、其来源何在，中国工人的地位到底如何，“**唯一的途径便是进行比较**”，比较的对象，既有1949年以前的中国，也要有其他共产党国家当代与过去的政策，亦不能放过中国的东亚邻居（如日本），还有资本主义世界（如美国）。正是通过这些比较，华尔德或是推翻或是修正了自己种种预想，“**过去在我看来是中国特点的现象实际上是共产党社会中权力模式的一些变异**”。

思想“在场”：前景之展望

- 总而言之，在开题立意之前，研究者要确知研究对象具有总体史的研究意义，进而发现地方史料同既有认识的不同之处，继而将其研究重新置于学术史中审视。
- 这就要求研究者有**总体史的问题意识**，发掘**地方独特性的敏锐视角**，以及**同学术史对话的自觉**。如此，研究者的努力才是找到“意义”的，是思想“在场”的。
-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化，并非依靠“村庄故事”的堆积而完成。必须通过反思这种只发掘史料而忽视思想的短视，研究者才能找到具有思想和灵魂的历史书写方式，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宋学勤, 李晋珩. 思想“在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点[J]. 史学理论研究, 2017(04):44-54+158.
2. 宋学勤. 反思中国社会史研究[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7(01):26-33.

1. 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 齐心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章、第四章和第五章。
2.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五章。
3.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出版2017年版，译者代序、2017版新序、第四章。
4.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5.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THANKS !